
上海建设全球资产管理中心研究

赵晓菊¹

(上海财经大学 200433)

【摘要】: 上海要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 首先应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全球资产管理中心。上海应构建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和营商环境, 探索提升金融监管能级和监管效率, 在地税范围内对中外资顶尖资管机构加大税收激励, 吸引大型中外资机构来沪设立资管公司等。

【关键词】: 资产管理 金融生态 营商环境

【中图分类号】: F830. 3. 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1309(2020)04-0035-009

一、上海建设全球资产管理中心的背景、意义、现状及问题

(一) 上海建设全球资管中心的背景及意义

打造全球资产管理中心, 是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十四五”时期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进阶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

从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看,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高, 中国资本市场不断发展完善, 行业环境日益优化, 为各类机构资产的配置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波士顿咨询公司 BCG《GLOBAL ASSET MANAGEMENT 2019》报告指出, 尽管 2018 年中国资管市场规模较 2017 年(4.2 万亿美元)下降至 3.8 万亿美元, 但是中国资管市场仍然存在巨大的潜力。据有关统计, 中国资管市场规模由 2012 年的世界第 8 位上升为 2018 年的第 4 位, 仅次于美国、英国和日本。预计至 2025 年, 中国资产规模增长率将超过 200%, 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资管市场。根据战略咨询公司 CaseyQuirk 预计, 到 2030 年, 中国资管行业将达到 17 万亿美元, 中国资管市场发展潜力巨大。因此推动中国资管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对于居民财富的增值保值和促进国内经济的转型升级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二) 中国资管行业发展面临的现状及问题

中国资管行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中国资产管理行业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统计数据显示, 包括银行理财、信托、保险资管、券商资管、公募基金、基金子公司、私募基金等在内的资管市场规模约 124.03 万亿元(银行理财规模截至 2018 年 5 月, 其他截至 2018 年 6 月), 虽然较 2017 年略有回落, 但从总体发展水平来看, 中国资管行业仍然处于快速发展阶段, 预计到 2020 年, 我国高净值人群和一般家庭的可投资资产总额将分别达到 97 万亿元和 102 万亿元。从行业发展来看, 各类金融机构资管业务发展极不平衡。

¹基金项目: 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重点课题(编号 2019-A-012-A)。

作者简介: 赵晓菊, 教授、博士生导师, 上海财经大学国际金融中心研究院院长。本文参与撰写人员: 黄雪军、刘林、仲骊、吴琳琳、牛志艳、孔伟、王祝遥、张新磊、于诗洋、张航、曾坤、傅诗棋、魏萌。

1. 公募基金行业发展结构不均衡。

根据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2019 年 6 月 17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9 年 4 月底,我国境内共有基金管理公司 124 家,基金数量 5849 只,管理的公募基金资产合计 13.91 万亿元,其中 60%为货币基金,而公募基金占 GDP 的比例只有 15%,远低于美国 110%的水平。

2. 私募基金长期资金来源不足。

私募及基金已成为创新资本形成的重要载体,但与公募基金相比,中国私募股市场缺乏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在美国,养老金、保险机构等是私募股市场的主要资金来源,而国内私募管理机构在开展机构业务时受限颇多。

3. 养老金等长期资金占 GDP 比重低。

从美国发展经验看,保险和养老资金都是促进标准化资产管理市场大发展最重要的资金推动力量。我国人口红利期已经过去,建立起完善的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至关重要。咨询机构 Willis Towers Watson 指出,养老金资产规模前 22 位的国家(Top22),资产占 GDP 的平均比重为 67%,其中美国为 131.2%,而中国养老资产仅占 GDP 的 1.5%(企业年金部分,总量约占 10%)。

二、国际资产管理行业发展的现状、特点及趋势

(一)国际资管行业发展的现状

由于市场和地缘不稳定态势的持续,2018 年全球资产管理规模出现下滑情况,下降至 74.3 万亿美元,其中,北美市场是全球范围内资管行业规模下降幅度最大的地区,2018 年北美资产管理行业规模为 35.2 万亿美元,同比下降 5%,拉丁美洲是唯一资管业务水平上升的区域,2018 年其资管业务水平同比增加 8%。

(二)国际著名资管中心的特点

1. 纽约:三“高”一“低”。

美国资管业务兴起于 20 世纪 70—80 年代,当时随着富裕人群和高净值人群理财需求的日益旺盛,美国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开始大力发展资管业务。以纽约为主的美国资管行业有以下特点:

(1)资管规模大。根据 Towers Watson 统计的数据,截至 2017 年底,全球前 500 名资管公司的可支配资管规模合计达 93.8 万亿美元,较 2016 年增长了 15.6%,北美地区 AUM 占比最高达 58%,同比增速也达到 15.08%。美国在所有发达市场中资管规模最大、在全球市场份额提升最大,资管额同比增长 14%,在全球市场中占比也提升了 1.5%。据美国投资公司协会发布的《2018 年美国投资公司发展报告》,截至 2017 年底,美国投资公司管理的资产共计达 22.5 万亿美元,占美国家庭金融资产的 24%;基金资产中 59%为股票型基金,21%为债券型基金,20%为货币市场基金、混合型基金以及其他基金。

(2)市场集中度高。经过多年的激烈竞争和兼并重组,美国的资管行业形成了倒金字塔格局,市场集中度较高。美国拥有一大批全球资产规模最大的基金公司,包括 Black Rock, Vanguard 等。根据 IPE 集团(INVESTMENT & PENSIONS EUROPE)发布的《2018 顶尖 400 资产管理人》报告,排名前 10 位的资管公司中有 9 家总部设立在美国,全球排名前 400 的资管公司中,有 150 家资管公司总部设立在美国,资产规模占比达到 61.12%。截至 2017 年底,美国排名前 10 位资管公司的资管规模占到全美 150 强资管公司的 51.20%,占全球前 400 家资管公司的 31.29%;排名前 10%的资管公司管理规模占全美 150 强公司管理规模的 60.79%。

(3) 银行系资管机构参与度高。截至 2017 年底, 在全球前 20 大资管公司中, 美国的资管机构有 12 家, 其中银行系的资管公司有 4 家, 包括道富环球、摩根大通、纽约梅隆资管以及富国银行。按照管理模式和业务特点, 可将商业银行资管业务经营模式划分为 3 类: 一是业务条线子公司制为主要形式的综合性银行(摩根大通银行、美国银行、花旗银行、富国银行等); 二是矩阵式管理的综合性银行(主要是欧洲国家的商业银行, 如汇丰、渣打等); 三是以资产管理业务为主的银行(如纽约梅隆银行、道富集团等)。

(4) 税收水平低。2017 年 12 月, 美国特朗普总统签署了 30 年来美国最大的税法改革, 将企业所得税从 35% 下调至 20%, 企业税负大幅度降低。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取消遗产税和净投资所得税, 或者提高遗产税的免税额。美国中产阶级和富人投资意愿增加, 将释放出大量资产管理需求。

2. 伦敦: 三“优”鼎力。

早在工业革命之前, 伦敦已成为世界金融中心, 全球绝大部分金融机构集中于此。伦敦在 2019 年发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排名中列第 2 位, 仅次于美国纽约。伦敦还有世界第 2 位的国际保险市场, 有最古老的证券交易所、黄金市场, 这里的欧洲货币市场和商品市场在国际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总体来看, 英国资管行业能够蓬勃发展主要得益于其“三优”的资管环境, 即: 优惠的税收政策、优越的监管环境和优质的资金来源。

(1) 优惠的税收政策。

英国拥有对基金以及资产管理公司而言最有竞争力的税收制度。2013 年起, 英国政府开始实施投资管理战略, 重点是改善英国的税收制度: 英国的公司型基金(OEIC)及信托型基金(AUT)均适用 20% 的企业所得税, 是 G7 和 G20 国家中最低的; 在避免双重征税协定方面, 设立在英国的基金可利用大约 120 个双重征税协议, 例如 2010 年 6 月英国与中国香港签订了全面性避免双重征税协定, 香港地区居民在英国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获得的股息收入从原 20% 的预扣税下降为 15%。良好的税收环境能够有效地吸引全球的资产管理公司在伦敦注册并广泛开展业务。

(2) 优越的监管环境。

英国拥有高效、公平和原则性强的监管环境。英国金融市场行为监管局(FCA)对所有在其境内注册的金融机构进行严格的监管。此外, FCA 特别重视投资者权益保护, 制定了关于投资消费者投诉的具体流程, 以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同时还要求金融机构必须定期上报和公开相关的投诉信息。公正透明的金融监管制度, 既能应对金融市场的新变化, 又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经营主动性, 还始终能较好地保护市场投资者利益, 提高市场公信力, 达到鼓励投资的目的。

(3) 优质的资金来源。

伦敦市场专业化和国际化程度较高, 从投资者结构上看, 机构投资者占据了绝对地位, 由机构投资者持有的市值连续 4 个统计年度超过 85%, 其中, 养老基金连续 5 年均为资管市场最大资金来源, 截至 2018 年末其占资产管理总市场份额的 45%。

3. 新加坡: 发展最快、最具吸引力的国际资管中心。

1998 年 2 月, 新加坡提出在“5 到 10 年内建成世界级金融中心”的战略目标, 紧接着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成熟的资本市场、透明稳定的金融监管体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税收优惠政策, 使全球资管机构不断汇聚到新加坡。

(1) 主要的改革举措。一是进行深刻的制度改革。这包括金融监管制度的改革和法制体系建设的改革。二是大力支持金融中

介和金融市场的市场化和国际化发展。三是支持国际金融中心基础条件的充分准备。四是建立关键的金融市场和培育核心的金融企业。

(2)新加坡将发展资产管理市场和债券市场作为建设世界级国际金融中心的两大主要突破口。新加坡发展成为亚洲首要资产管理中心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更多全球基金经理在新加坡设立办公室,且将新加坡视为亚洲投资的基地;二是亚洲投资者以新加坡为基地,向亚洲以外及世界市场进行投资。

(3)通过简化法规推动资管市场发展。为将新加坡建设成为亚洲首要资产管理中心,新加坡金融监管局(MAS)深化并扩大新加坡资本市场,通过简化法规为基金经理们提供便利。新加坡政府将政府基金交由私营基金公司进行管理,使得新加坡资产管理公司在短时间内迅速壮大。中央公积金投资计划(CPFIS)的有关规则进一步放松,以鼓励会员允许专业资管公司管理可供投资的基金。补充退休计划(SRS)也着手为个人退休金储备更多资金,这进一步刺激了资产管理业的需求。

三、上海建设全球资产管理中心的基础及机遇

(一)上海建设全球资管中心的基础

目前,上海已建立起包括全国性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商品期货市场、黄金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场等较为完备的金融市场体系,同时也建立了包括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等在内较为健全的金融机构体系,能够为金融资产的高效配置提供良好的平台,为建设全球资产管理中心提供了良好的环境。随着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政策的深入实施,大量外资资产管理机构涌入上海,截至2019年6月,已有56家国际知名资管机构在陆家嘴设立了77家各类资产管理机构,集聚跨国公司总部数量107家。随着新一批全球资管机构和创新业务在陆家嘴集聚,上海已形成一个优质的资管“生态圈”,向打造全球资产管理中心的目标又迈出坚实的一步。

(二)上海建设全球资管中心的机遇

随着英国脱欧、瑞士“避税天堂”的落幕,国际一系列金融机构和高净值客户开始转移,新加坡正在取代瑞士,成为下一个全球最大的离岸账户财富中心,中国香港已取代纽约,成为全球超高净值人士居住人口最多的城市,因此上海需要把握全球财富增长向亚洲倾斜和我国国民财富快速增长的重要机遇,提升上海配置全球金融资源的能力,进一步深化金融对外开放,吸引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机构集聚,加快建设全球资管中心的步伐,发挥资产管理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支撑作用。

四、上海建设全球资产管理中心面临的压力及瓶颈

上海是我国金融市场体系最完备、金融要素市场体系相对完整的国际化大都市,有着健全的金融机构服务体系、多样化的金融产品和不断创新的金融服务。但与纽约、伦敦、新加坡等国际著名资产管理中心相比,上海在国际化程度、营商环境、税收政策等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同时,上海还面临来自国内城市的竞争压力。

(一)来自国内城市的竞争压力

1. 北京。

中国金融监管的主体机关“一委一行两会”——金融委、人民银行、中国银保监会、中国证监会,全国性金融行业协会均设在北京,中国四大国有银行,中国20%的世界500强企业总部,高盛、安盛、摩根大通,新三板市场,“亚投行”的总部也均驻北京。

北京银行业金融机构数量持续增加,而银行业作为北京金融业的核心具有良好的发展优势。中国四大国有银行的4家理财子公司有3家设在北京。2018年以来,随着资管新规等多项监管政策相继落地,银行理财业务积极顺应监管趋势,加快推进业务转型,积极创新研发净值型产品,推动金融科技在银行理财中的应用,行业规模整体保持稳定。

2. 深圳。

深圳在吸引金融机构和金融人才的先天优势上不如北京和上海,但深圳金融创新生态环境更显优越。

为支持金融业的发展,深圳市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尤其在吸引和发展总部经济上,深圳给予了极大的支持。根据《深圳市扶持金融业发展的若干措施》(深府规[2018]26号),深圳吸引支持总部经济和金融机构的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一次性落户奖励及搬家补贴、增资奖励、购地支持、购置/租赁自用办公用房补助等。该文件还在金融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金融企业跨地区并购重组、金融租赁、金融企业分支机构及子公司落户等诸多方面设立了相应的扶持政策。为促进前海金融业集聚创新发展,深圳发布了《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支持金融业发展专项资金实施细则(试行)》,对在前海注册及新迁入前海的金融及其他相关企业,包括金融企业总部、金融企业一级分支机构、持牌金融机构、其他金融及金融服务机构等,予以全方位扶持。

深圳在金融人才培养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和鼓励政策。深圳市财政每年安排5000万元专项资金,加强金融人才队伍建设。对于高端人才培养每年每人给予10万元的课程培训补贴,中端人才培养每年每人给予5万元培训补贴。此外,政府还组织高校对低端人才进行免费培训。对拥有特许金融分析师(CFA)、金融风险管理师(FRM)、北美精算师等国际通行金融资格证书的金融人才,深圳给予每人最高5万元补贴。

(二)上海存在的差距

1. 金融机构能级不够高。

随着“资管新规”的落地,银行设立理财子公司已是大势所趋。尽管目前上海已集聚了众多资管机构,但中国四大商业银行的资管总部并未落户上海。目前建行资管子公司已在深圳注册。而农行、工行理财子公司则在北京注册。北京作为全国金融中心和决策中心,对金融机构总部的吸引力不言而喻。而深圳为了吸引总部机构集聚,出台了一些相关政策。2018年12月,深圳发布《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扶持金融业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其中,对金融企业总部给予一次性落户奖励及搬家补贴、增资奖励等。此外,该文件不仅对金融总部机构进行支持,在金融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金融企业跨地区并购重组、金融租赁、金融企业分支机构及子公司落户等方面设立了相应扶持政策。

2. 金融业市场化程度和国际化程度有待提高。

与新加坡相比,上海金融业市场化程度和国际化程度均有待提高。新加坡依托稳定的整治环境和优惠的税收环境,已成为国际性的离岸财富管理中心。《2018新加坡资产管理调查》显示,2018年在全球资管行业规模总体下滑的情况下,新加坡的资管规模逆势上扬至2.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4%,其中75%的资金来源于境外。新加坡资管机构的资金来源和服务对象大部分来自北美和欧洲,还有一部分来自东南亚的家族企业以及澳洲和新西兰的资金,实现了资产的全球化配置。

深圳作为大湾区的核心城市之一,“大市场、小政府”的市场环境适合有活力的金融机构发展。在鼓励创新方面,深圳市政府每年都会提供专项资金鼓励金融创新,2019年有405亿元专门财政资金用于支持各类产业发展的专项资金。深圳无论对金融机构还是对其他企业的扶持政策都是公开透明的,企业可以在政府网站上查到相关文件。什么类型的企业适用什么样的政策,都有清楚的规定。

3. 对国际金融人才的吸引力有待加强。

要实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应具备的金融服务功能,需要具备丰富的金融人才。2018年上海金融从业人员超过36万,仅占全市就业人员总数的3%,相比之下,中国香港、新加坡是5%,纽约是10%,伦敦是25%。《上海金融领域“十三五”人才发展规划》提出,到2020年,金融从业人员拥有的国际资格认证证书需达到3.5万张左右,目前缺口较大。上海能否实现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战略目标,不仅取决于要素市场发展,更取决于是否具有大量熟悉现代金融运营机理,有较强市场影响力的战略人才。

4. 税收政策缺乏国际竞争力。

2019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显示,中国总体排名大幅提升,上海作为权重为55%的样本城市,为中国营商环境的改善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从全球范围看,高税率是影响上海营商环境评价的重要因素。表1是国际资管中心所在地及中国主要税种和税率的对比。

表1 国际资管中心所在地及中国主要税种和税率(2018年)

国家和地区	公司所得税税率 (%)	业主缴纳社会保险税率 (%)	个人所得税税率 (%)	雇员缴纳社会保险税率 (%)	间接税率 (%)
美国	27	7.65	37	7.65	0
英国	19	13.8	45	2	20
新加坡	17	17	22	20	7
中国香港	16.5	0	15	0	0
上海	25	32.9	45	10.5	17

资料来源:KPMG

(三) 上海存在的发展瓶颈

1. 金融生态环境方面的制约。

一是对外开放政策接连颁布,但缺少细则,难以执行。2019年7月21日,国务院金融委颁布11条金融业加大对外开放的措施。外资机构普遍反映,对外开放政策11条没有任何明确可实施的细则或说明。二是因资管行业未列入重点发展行业,外资机构设立受重重限制。一家外资银行的分行要获得资管业务资质,需要与中资银行总行具备同样要求,这有悖于中国鼓励支持外资资管机构在华在沪设立外资资管机构的对外开放政策。尽管中国金融监管部门已表示在外资金融机构申请设立分支机构时会考虑其母公司的实力和母公司的担保,但至今尚未公布如何实施、何时实施。三是对跨境数据传输及全球共享尚无明确法规,成为一大障碍。

2. 监管政策经常变化、监管协调成本高。

一是金融监管政策经常变化,外资机构感到难以形成预期。近年来,中国不断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外资机构普遍反映我国监管政策存在变化频繁、连续性、稳定性偏弱,难以形成预期。如2018年4月29日证监会宣布发布《外商投资证券公司管理办法》,即日起,符合条件的境外投资者可根据新规,向证监会提交变更公司实际控制人或者设立合资证券公司的申请材料,允许外资持有基金公司股权比例达到51%,3年后可持股100%,这一规定从根本上,放开了我国证券业的外资控股权;2019年7月20日,为进

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决策部署,将原定于2021年取消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和期货公司外资股比限制的时点提前到2020年。总体而言,政策的不持续和不稳定,部分是由于我国金融业的不断开放导致的,对于国际金融机构来华开展业务一方面是利好消息,意味着我国证券业对外开放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即外资可以全资设立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和期货公司,而不必受国内相关公司的牵制,但另一方面持续变动也使外资机构谨慎性提高。二是上海监管协调成本较高。上海在金融监管政策方面缺乏“话语权”。中国金融委、央行、中国银保监会、中国证监会、中国外管局等监管机构总部均设在北京,上海要开展一些重大的金融创新,必须多次跑北京向不同的金融监管部门请示、汇报。

3. 资管行业税收体系缺乏顶层设计。

一是在沪外资资管机构管理全球资产是否会重复征税尚不明确。在新加坡、中国香港、纽约、伦敦的国际资管公司,都可管理全球资产,而且按照国际惯例明确规定不重复征税。这是一个金融中心能否成为全球资管中心的必备条件。如果上海不能明确承诺不会对外资资管机构在上海管理全球资产重复征税的话,那么外资资管机构在上海就只做在岸资管业务,不敢做全球资管业务。这样上海就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资管中心。二是高额税率使很多外资资管机构和高级主管望而却步。新加坡和我国香港都实行单一税率,香港对机构、法团征收的最高税率为16.5%,新加坡为17%,但新加坡将资管行业定位为重点支持行业,对总部设在新加坡的资管机构有税收优惠,一般税率在12%~15%左右。相比中国大陆累进个人所得税最高可达45%,新加坡非纳税居民的工作收入按照15%的税率纳税,董事费、咨询费以及其他收入的税率是20%。香港个人工资性收入所得税采用15%的标准或2%~17%实行4级超额累进税率,利得税和物业税都采用15%的标准税率计税。

4. 高端人才激励机制偏弱。

上海生活成本高,与深圳相比,在专项资金补助、住房补贴、人才落户、子女教育等方面缺乏优势。此外,较高的个人所得税和缓慢的退税政策也大大降低上海对人才的吸引力,个人所得税的税率高低对金融人才聚集度有较为直接的影响。

5. 公共服务体系尚不够完备。

一是缺乏专业的第三方服务机构。金融机构在资金融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为了更好地服务客户及风险管理,需要将一些业务托管给第三方服务机构。由于国际资管机构与国内机构在沟通交流、操作流程及管理制度等方面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异,国内第三方服务机构还不能满足外资机构的工作要求。二是针对外籍人员子女的教育资源匮乏。吸引国际金融人才落户上海,不仅仅要考虑住房问题,也要考虑其子女教育问题。外籍人员子女年龄尚小,家长为了子女的未来,必然期望子女能够接受优良的教育。上海目前针对外籍人员子女的教育资源与中国香港、新加坡等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主要体现在学校数量、教学质量两个方面。

五、上海建设全球资产管理中心的主要抓手

(一) 制定“上海建设全球资产管理中心行动方案”

目前,中国资本市场的股票交易额、黄金现货交易额等数量指标中国已居全球第一,但中国的资产管理行业、在上海的全球资管机构等指标,与纽约、伦敦、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国际成熟的国际金融中心相比相距甚远。上海要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首先应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全球资产管理中心。为此,建议上海市政府制定出台“上海建设全球资产管理中心行动方案”(简称“行动方案”),结合上海建立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针对资管中心制定更为详细具体的策略,并将其正式列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中。

(二) 充分发挥全球资管行业协会的积极作用

2018年11月12日,陆家嘴金融城召开“国际资管行业发展大会”,“陆家嘴金融城全球资产管理机构联合会”正式揭牌成立。陆家嘴金融城全球资产管理机构联合会(简称全球资管联合会)首届会员单位由46家机构组成,包括31家全球知名资产管理机构在陆家嘴设立的独资子公司。尽管成立时间不长,但陆家嘴全球资产管理机构联合会的影响范围正在不断扩大。2019年5月7日,法巴资管、荷宝资产、未来资产等10家境外知名资管公司与陆家嘴金融城签署合作备忘录,扩大在华业务。为更好地指导和支持外资资管机构参与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简称中债登)作为首家特别会员加入陆家嘴全球资产管理机构联合会。中债登的加入将发挥陆家嘴金融服务业的产业集群综合优势,更好地服务全球资管机构投资中国债券市场,促进上海发展成为全球人民币产品交易主平台和定价中心,支持上海打造全球资产管理中心。

全球资管联合会的成立承担了以下4个“平台”的任务:一是成为资管行业业界互动交流的平台,促进行业治理和自律,优化市场结构。二是成为政府提供高效服务的平台,成为监管机构和地方政府贴近市场、提升服务的纽带。三是成为资管机构综合服务的平台,不断吸收和吸引优秀的市场机构投资者,基金托管方和代销方,法律、财务、人才等第三方服务方加入,构建促进资管行业发展的综合体系。四是成为海外推广和对外交流的开放平台,协助推广陆家嘴金融城品牌,促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服务一带一路等职能。

(三)举办全球资产管理峰会

2018年北京举办“2018全球财富管理行业峰会”,但参与的嘉宾多为各国政要,峰会的目的也落在为高资产净值人士透视全球财富管理带来一个崭新的视角和格局。与北京的峰会相比,上海一方面要在参会嘉宾的邀请上应当展现出上海更多的特色和优势,另一方面要在峰会的最终愿景上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依托全球资管联合会的资源优势,“上海峰会”应邀请到更多来自各国资产管理行业内的资深专家。因此,“上海峰会”的举办需要全球资管联合会在会议筹备过程中运筹帷幄,借助举办峰会的契机,政府相关部门参与其中,与外资机构深入交流,和外资机构探讨上海建设全球资管中心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难题,站在外资机构的角度来考虑落户上海的问题,从而提高上海在吸引外资机构方面的竞争力,增强上海资管行业的实力。

六、上海建设全球资产管理中心的对策建议

(一)构建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和营商环境

1. 尽快制定上海实施金融委11条中关于鼓励支持境外金融机构在上海投资注册设立资管公司的相关细则。经济、金融、财税政策的公开、透明、明确、稳定、实操性强,这些都是构成良好金融生态和良好营商环境的重要条件。建议上海市政府有关委办主动与国务院金融委沟通,尽早出台关于鼓励支持境外金融机构在上海投资注册设立资管公司的相关细则,包括机构与个人税收先征后奖、办公楼费用补贴、紧缺人才公寓等鼓励激励政策。

2. 将资产管理作为上海重点支持的行业,制定相应政策措施。2020年上海要建设形成“6+1”格局的国际金融中心。“6+1”格局中“六大中心”中的第一个中心即在上海建设全球资管中心。把资管行业作为重点发展对象,在资管公司(尤其是外资资管公司)设立、取得资管资质时,明确可以考虑外资产母公司的经济实力,在母公司愿意为其担保的情况下,可以大幅减少申请设立外资资管公司的注册资金要求和人员数量要求。

3. 与有关部门共同研究推动出台关于跨境数据传输、出境的具体要求。尽快主动与国家网信办、中国证监会、中国银保监会沟通,尽快明确哪些数据可以出境、哪些不能出境,数据出境要经过哪些程序。

4. 建议今后上海颁布对外开放政策时采用中英文双语发布。国际化、市场化、专业化,是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 and 全球资管

中心应达到的基本条件,建议上海以后在颁布新的对外开放政策文件之前,先聘请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专业的专家学者提供支持,将政策文件先翻译成英文,并申明中英文内容一致,如有任何歧义,以中文版本为准。

5. 建议上海率先出台对金融领域知识产权保护的指导原则。目前在资产管理、智能投顾等金融细分领域里,尊重各机构在算法、模型等方面所拥有、注册的知识产权。推动整个金融领域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引导金融从业人员自觉遵守资产管理行业的规则或准则。

(二)探索提升金融监管能级和监管效率

上海正在建设“五个中心”和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等。要出色完成这些重大战略任务,必须在金融监管方面探索一条有助于降低金融监管的协调成本、提升金融监管效率的创新监管模式。为此,建议在上海设立“金融发展与稳定联席委员会”(简称“金联委”),金联委由中国金融委、人民银行、中国银保监会、中国证监会、中国外管局等金融监管机构联合组成,建议由国务院分管经济金融工作的副总理担任金联委主任。金联委负责研究上海五大中心和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发展中的金融发展、金融安全和金融监管的重大问题及制定相关金融功能监管的政策。

(三)在上海地税范围内对中外资顶尖资管机构加大税收激励

上海要成为全球资产管理中心,不仅要把外资资管机构吸引到上海注册,更重要的是在上海设立资管机构可以管理全球的资产。要做到这一点,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是:应当遵循国际惯例,不重复征税。建议制定政策避免重复征税。与外管、银保监会共同研究先行先试,为中外资顶尖资管机构管理全球资产扫清障碍。还可借鉴深圳经验,试点对总部机构和资管等重点行业高管个人所得税先征后奖。

(四)吸引大型中外资机构来沪设立资管公司

借鉴深圳经验,在办公用房租金适当补贴、地方税返还等方面制定系列配套激励政策,吸引国际国内大型资产管理公司来沪注册、运营。鉴于工行、农行、中行这三大银行已在北京设立理财公司总部,建行已在深圳设立理财公司总部,建议尽快制定系列配套政策吸引四大银行的理财子公司在上海设立运营公司——相当于在上海设立理财子公司二总部。制定相关政策,吸引国际国内大型保险公司来上海设立资产管理公司、开展养老保险等专项保险和理财业务。

(五)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为中外资管及金融机构高管提供优质服务

支持专业的第三方服务机构设立和拓展业务。由于国际资管机构与国内机构在沟通交流、操作流程及管理制度等方面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异,国内第三方服务机构并不能满足外资机构的工作要求。应出台相关措施,鼓励支持国际、国内第三方服务机构在上海设立并开展业务,推动上海建设全球资管中心。

安排解决人才公寓。上海的人才公寓,在总体数量上与需求相比还有较大缺口。建议上海市有关部门会同各区为中外资管机构高级人才在离工作地点不太远的地方安排解决人才公寓。通过各种有效方式,为中外资管机构高级人才解决子女入托入学问题。

参考文献:

[1]牛锡明. 财富管理是银行经营转型的方向[J]. 中国金融, 2011(8):12-14.

-
- [2]姜再勇. 关于国内资产管理业务发展问题的思考[J]. 金融监管研究, 2013, (11):37-47.
- [3]李刚. 国际领先银行财富管理的经营实践[J]. 金融管理与研究, 2007(4).
- [4]吴轶. 上海建设全球资产管理中心战略路径与对策[J]. 科学发展, 2019(1):43-51.
- [5]云佳祺. 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国际先进银行的经验及启示[J/OL]. 南方金融:1-8[2019-06-15].
- [6]张杨, 张利华, 张彤. 银行业资管业务发展与实体经济融资关系研究[J/OL]. 金融发展研究:1-6[2019-06-16].
- [7]王小琪, 任申浩. 西部财富管理中心的建设思路与发展路径探讨——以成都为例[J]. 西南金融, 2018(9):3-7.